

● 世界历史

# 1923 年鲁尔事件与欧洲格局巨变<sup>\*</sup>

张 涛

(华中农业大学 外语系,湖北武汉 430070)

[作者简介] 张 涛(1957-),男,安徽淮南人,华中农业大学外语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关系及跨文化交际研究。

[摘 要] 鲁尔事件是一战后初期国际关系调整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欧洲霸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促使凡尔赛体系迅速解体,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 鲁尔事件;欧洲格局;巨变

[中图分类号] K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3-0317-08

鲁尔事件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10 年间世界最具影响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争夺欧洲霸权展开激烈斗争的结果。本文从宏观视角,以一战后初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背景,分析各种矛盾与整个欧洲局势演变的关系,揭示了鲁尔事件不仅使得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其结果也使巴黎和会上所确立的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和新秩序——凡尔赛体系砰然解体,造成欧洲格局的巨大变化。

## 一、一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一战的直接结果就是打乱了世界工业化进程,严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欧洲首当其冲,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倒退了 8 年,从 1881 年到 1913 年期间,欧洲制造业的产量平均每年增加了 1/3,而在 1913 年到 1920 年的 7 年间,欧洲的制造业产量下降了 23%。德国、法国、比利时和东欧多数国家,工业产量较战前至少低 30%。欧洲大陆的农业生产约低于战前的 1/3,欧洲的铁路系统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运输不畅。欧洲不仅缺乏煤炭和其他原料,而且也缺乏粮食,特别是中欧的某些国家。欧洲的国民收入遭受损失,三个工业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人均收入在 20 年代中期还低于 1913 年<sup>[1]</sup>(P. 41)。欧洲各国国内经济严重失调,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物价上涨水平为战前的 1 倍至 20 倍。欧洲贸易秩序紊乱,德国贸易总量减少到战前贸易量的 1/2,法国和英国的出口量分别减少到 1/4 和 1/2。欧洲市场比战前大大缩小,而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这样一些非欧洲国家所占的份额却大幅度上升。除此之外,德国的战败、奥匈帝国的解体进一步猛烈地冲击着“那已被战争弄得摇摇欲坠的和支离破碎的、脆弱的、复杂的经济组织”<sup>[2]</sup>(第 31 页)。在中欧和东欧,由于奥匈帝国的解体,使原来强有力的巨大的经济单位被打碎,民族国家的数目大为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海关和关税壁垒的建立导致欧洲市场失去活力,萧条萎缩。当时在欧洲有 27 种不同的货币,

而不是战前的 14 种,另外还有 12 500 英里的边界,许多边界把工厂和原料产区隔开,使铁厂远离煤田,农场远离市场。这些都大大加剧了一战后初期欧洲经济状况的恶化。

欧洲经济因战争而造成的衰弱形成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特殊变化,大大改变了世界生产与贸易的模式。战争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1913—1920 年美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煤从 3% 增加到 4%,钢从 4% 增加到 58%,小麦从 23% 增加到 29%<sup>[3]</sup>(第 321 页)。它的国民财富由 1912 年的 1 870 亿美元增加到 1920 年的 5 000 亿美元,几乎超过了整个欧洲。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变为债权国,其海外投资增加了 4 倍,总数已经超过英国。美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一跃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和美国世界地位的上升,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为美国进入欧洲,插手欧洲事务奠定了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以欧洲为中心的列强争霸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英法联合打破了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它是在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性和平体系,是根据战胜国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的意志,强行重新划定的欧洲、西亚、非洲的政治地图。凡尔赛体系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这两个大国排除在世界政治舞台之外,维护了英国的殖民霸权和海上优势,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它所确定的国际格局的均衡,仅仅是几个战胜国根据新的力量对比,经过激烈较量之后所达成的暂时妥协而已,它不仅没有消除矛盾,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化、复杂化。在欧洲,除了英德矛盾因暂时得到缓解但仍潜在以外,突出的矛盾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法德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英法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矛盾对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起着制约作用。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欧洲霸权,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使它犯了一个大错误——占领鲁尔,使各种矛盾立即激化,法德两败俱伤,英国无力控制欧洲局势,美国乘机进入欧洲,凭借经济实力平息了危机。

## 二、鲁尔事件与各种矛盾的激化

如何对待德国赔款问题,实质上是战胜国怎样调整战后欧洲的秩序和权益问题,因此,赔款问题成为 1919 年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强外交斗争的重点。赔款问题包括三个方面:赔款范围、赔款总数和赔款的分配,后两个问题是赔款问题争论的焦点。由于英法美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很大,所以《凡尔赛和约》只在原则上要求德国承担战争责任,并对战胜国提供赔偿。但赔偿总数应是多少,德国赔偿能力怎样,交付的方式和期限如何,各战胜国按什么比例分配,这些重要问题巴黎和会一个都没有解决。和约仅规定成立特别的赔偿委员会,在 1921 年 5 月 1 日以前确定应在 30 年内付清的总额。巴黎和会拉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帷幕,一轮新的、更加激烈的争夺将不可避免。

巴黎和会后,德国赔款问题转入由法国操纵的赔款委员会处理时期。赔款委员会由英法意比 4 国代表组成,法国代表担任主席。主席的权力很大,在通过决议时,如果表决各为 2 票,规定由主席作出最后裁决。为落实《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自 1920 年春以来,战胜国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频繁地举行协约国总理最高委员会会议。1920 年 7 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斯巴开会,会议没有确定赔款总额,但最后确定了协约国各方应得赔款的比例:法国 52%,英国 22%,意大利 10%,比利时 8%,日本 0.75%,其他归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会议保留美国应得赔款的权利。斯巴会议并未解决在赔款问题上的矛盾。法国对会议的决议尤为不满,认为缺乏严格的保证措施,德国也不想实施会议的决议。在法国的提议下,赔款委员会于 1921 年 1 月在巴黎举行会议,将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德国赔款总额定为 2 260 亿金马克,要求 42 年内付清。此外,德国的全部财富,尤其是关税应作为缴付赔款的保证。如遇德国不履行诺言时,赔款委员会可以将海关的收入抵充,甚至可以接管。两个月后,德国外长西蒙在被邀请参加协约国伦敦会议时提出相反建议:赔款总额定为 500 亿金马克,而其中 200 亿金马克德国已用煤炭、在

辆等作抵,业已偿清,其余 300 亿金马克只有在上西里西亚留在德国版图和恢复德国正常的国际贸易条件下才能缴付。协约国对这项建议十分恼火,3 月 3 日协约国向德国递交了最后通牒:如果 3 月 7 日前不承认巴黎会议决议,将立即实行军事制裁。经过几天毫无结果的谈判,3 月 8 日协约国军队占领了杜塞尔多夫等鲁尔地区的 3 个门户,并在莱因河上建立海关,对出入未被占领的德国其他地区的货物征收 50% 的关税,交给赔款委员会。

英国与法国在处置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在巴黎和会上就初见端倪。英国并不希望一战后已经倾斜的欧陆均势进一步倾向法国。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在这一段时间里(1920 年 1 月《凡尔赛和约》生效——1921 年 5 月 11 日德国被迫接受赔偿计划)能同法国合作一道制裁德国呢?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国内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束缚了英国的手脚。更严峻的是,战后英国经济尚未好转,从 1920 年下半年起,又陷入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不啻雪上加霜。整个英国工业生产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下降了 46%,超过了英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在经济上一片混乱的同时,国内的阶级矛盾也空前尖锐起来。工人罢工来势既快又猛,尤其是 110 万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不顾政府的武装镇压和工人领袖的阻挠,曾顽强地坚持了 3 个月之久。第二,英国在近东方面碰到了土耳其的兴起。对英国而言,近东问题比欧洲问题更为迫切。近东地处交通要冲,扼地中海进红海的咽喉,是英国到印度的必经之路,是保证其南亚和远东利益的生命线,近东的石油又是英国所必需的能源,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成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同时,印度、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这些都严重牵制了英国的力量。因此,英国极希望在土耳其问题上同法国合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面临着战后初期法国在欧洲、近东、殖民地问题上与自己争夺霸权的严重态势,但为了使法国在近东问题上合作,必须在德国问题上迁就法国。

但英法之间的这种“合作”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久,法国狂热的霸权主义分子普恩加莱再次出任总理,他主张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彻底削弱德国,与英国的对德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此后,英法德三国围绕德国赔偿采取何种形式问题,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英法从对立的总政策出发,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双方围绕着德国赔偿问题的你争我夺,从根本上震荡和破坏着凡尔赛体系,促使战后初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迅速发生演变。

外交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一战以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昔日称雄世界及欧洲的英国面对着严酷的局面:美国与其争夺世界霸权,法国与其争夺欧洲霸权。不仅如此,随着战争的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英国这个最大的殖民帝国的统治根基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这一切使英国外交处于错综复杂、困难艰辛的境地。但英国仍保持着其作为世界霸主的三大基础:一是拥有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富饶的殖民地;二是依靠一支最强大的海军和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控制着海洋;三是利用列强矛盾和操纵国联保持了在欧洲的仲裁者的地位。

英国对欧洲一贯推行“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即避免某一个大国的势力支配大陆。因为欧洲的霸权国家可以切断大陆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其海军可以把欧洲作为基地干扰大英帝国的交通,还可以封锁、骚扰甚至入侵英伦诸岛。英国的安全需要不同于大陆国家。大陆国家都希望在欧洲尽可能多地占有领土,同时阻止其他国家获得领土。英国谋求的只有后者。在 19 世纪,英国以惊人的方式扩张领土,但这种扩张是在亚洲和非洲进行的,而不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关心的是整个欧洲力量的平衡。欧洲各国企求的是尽可能地强大,英国不在乎哪个国家是否强大,只要没有一个国家过分强大就行。“英国维持均势的方法是自己置于天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总是放在与当时最强大的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独裁相对抗的那一边”<sup>[4]</sup>(第 403 页)。照英国的想法,弱国如能得到扶助,强国如能得到抑制,国际力量就可以取得平衡,欧洲就不会出现霸主,这才有利于英国保持仲裁者的地位,操纵欧洲。战前英国采取的是“扶法抑德”的政策,因为那时德强法弱,战后的情况恰恰相反,法强德弱,英国就转而采取“扶德抑法”的政策。巴黎和会是英国调整其欧洲均势政策内涵的转折点。

英国扶德有其更深刻的经济原因。《凡尔赛和约》缔结后,英国政府不仅仅关心从德国索取赔偿,而且希望德国恢复经济,并以此为中心,谋求有利于英国垄断资本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复兴”。战后欧洲

经济秩序的失衡,使得长期以来一直严重依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的英国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英国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欧洲经济关系正常化。但在世界已经联结为一个彼此难以分割的整体,各个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想要在战后初期整个欧洲经济秩序混乱不堪的状态中,恢复本国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后的一个显著特征。要“复兴”欧洲经济,德国是关键,这是由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在讲到德国与欧洲的关系时指出,欧洲的经济系统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的繁荣取决于德国企业的繁荣<sup>[5]</sup>(P. 42)。德国被看做是“欧洲的工厂”,因此恢复德国经济,发展包括德国在内的邻国贸易以增加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比收入了一批赔款要紧得多”<sup>[6]</sup>(第 1-2 页)。英国还打算在政治上扶持德国,使它成为反苏包围圈的重要环节。德国开始实施赔偿计划后,上述倾向就成为英国政策的主导方面。

法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其世界地位受到削弱,但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法国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因为德国的战败和奥匈帝国的崩溃而大大加强。战后初期,法国具有很大的优势,不仅是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言,就是对战胜国英国也是如此。因为根据《凡尔赛和约》,尽管英国取得的领土要比法国几乎多 4 倍,但大多数是不发达的殖民地,而法国取得的权益主要在欧洲:它从德国手中收复了东部富饶的地区,即经济发达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取得了对萨尔煤产区的代管权。由于洛林的收复,法国的炼铁生产能力提高了 70%,炼钢能力提高了 50%。和约中关于德国萨尔煤产区供应法国煤炭 15 年的规定,使法国煤炭严重不足的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法国不仅在战后扩大了冶金和纺织工业基地,而且原料、燃料问题也得到解决。另外,法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并且控制着小协约国。美国史学家休斯指出:“从 1919 年到 1923 年这四年间法国恢复了霸权地位,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强国来和它争夺这一领导地位,这一地位几乎是因空缺而转入法国之手。”<sup>[7]</sup>(第 193 页)

众所周知,法国与德国是世仇。历史上两国曾多次发生战争,结怨甚深。在一个世纪里德国军队曾三次入侵法国,因此,战后法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态度与英国政府相反。第一,它谋求彻底削弱德国,使它不可能东山再起,以维护和加强法国的霸主地位和本国的安全,并替本国垄断资本铲除德国这一竞争者;第二,在赔款问题上,法国主张,德国不仅应支付巨额赔款,而且首先要给法国赔款。赔款项目不仅包括一般的战费和因贸易的亏损造成的间接损失,还有繁多的索赔名目。

英国与法国在赔款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以及苏德《拉巴洛条约》对国际局势的影响,预示着一个新的、非常紧张阶段的到来。

鉴于德国政府请求延期交付赔款,协约国各方为协调彼此立场,于 1922 年 8 月在伦敦召开赔偿会议。会上法国代表团团长指责德国故意制造财政危机,以拖延缴付赔款。普恩加莱强调说,只有得到“有效担保品”作为切实保证,他的国家才肯同意延期缴付。英国政府则提出 10 条计划来对付普恩加莱的“有效担保品”方案,伦敦会议毫无结果地收场了。1922 年 12 月第二次伦敦会议,也由于英法两国分歧尖锐,会议开到第三天就中断了。同时,伦敦会议否决了德国政府向赔偿委员会提出的将赔款延期偿还 3 年或 4 年的建议。

法国早就觊觎着鲁尔。1922 年春夏之交,当赔款问题因德国要求延期支付而日趋尖锐时,法国决定占领鲁尔。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并且是法国向欧洲进行扩张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部分。第一,法国希望在再次向莱茵地区扩展的过程中控制德国经济,包括埃森、波鸿、多特蒙德等工业城市在内的鲁尔地区是德国重工业的心脏。该地区的煤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 88%,生铁产量占总产量的 70%,钢产量占总产量的 40%。早期德国的工业化就是以煤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20 世纪初,鲁尔地区已成为德国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支柱。法国占领鲁尔就将使鲁尔的煤和洛林的矿石联成一体,使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产钢国,这样法国的重工业就可以独霸欧洲,从而获得政治上对欧洲的控制权。第二,占领鲁尔进而“分离占据地与德国的关系,以武力使德国屈服为它的奴隶,最后的目的便是分裂德国,使巴维业等脱离普鲁士而独立,打破德国民族的统一,使德国降为完全无力抵抗的殖民地”<sup>[8]</sup>(第 180 页)。第三,占领鲁尔

可以在德国赔款和协约国战争债务之间确定一种确实可靠的联系,这种动机完全不次于取得生产方面的抵押品。第四,占领鲁尔一方面可以对英国施加间接的压力,以“放弃”鲁尔来促使英国支持法国的观点,同时,向英国表明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法国能够单独行动,而且也准备单独行动;另一方面等于扼住了英美的经济咽喉,法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德国的输出与英美之输入。斯大林针对法国占领鲁尔的意图深刻地指出:“占领鲁尔是在经济上瓦解德国的手段,是法国从德国取得赔款,取得法国冶金工业用的煤炭和焦炭,法国化学工业用的化学半成品成品和颜料的保证,是阿尔萨斯的纺织品免税输入德国的保证。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领导权建立物质基础。”<sup>[9]</sup>(第 249 页)

1923 年 1 月 11 日,法、比军队 8 000 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首先占领了鲁尔煤区中心埃森,接着又占领波鸿和多特蒙德,最后占领了整个鲁尔地区,到 3 月份,占领军达 10 万人。帝国主义列强在赔款问题上的矛盾,终于演变为一场尖锐的政治冲突。法、比出兵鲁尔是企图修改凡尔赛体系建立起来的“新秩序”的重大步骤。法国想独霸欧洲,必然要破坏帝国主义之间现存力量的平衡,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鲁尔事件牵动着帝国主义的中枢神经,成为当时欧洲国际矛盾的焦点。

占领鲁尔涉及到英法德美 4 国的切身利益。英国认为,第一,这是极端严重的事态。占领鲁尔并非和约所规定的制裁,暂不说经济影响,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第二,是对英国采取的充满巨大危险的军国主义政策。因为站在法国一边的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也想乘火打劫发一笔横财,这样鲁尔的冲突就可能发展成为全欧的军事冲突。第三,法国在西欧称王称霸,对德国随意制裁,动辄出兵占领德国领土,如果任其事态发展下去,德国就会遭受沉重打击,而法国的地位就会进一步提高,造成法德之间更大的不平衡。第四,如果听任法国控制比利时,又把洛林的钢同鲁尔的焦炭结合起来,把法国同德国西部所有矿山、工厂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英国工业不仅不能与之竞争,反而经济上将受制于法国。法国占领鲁尔宣告了英法协约和战时盟友的团结实际上的终结。鲁尔事件给英国提供了一个契机,英国准备充分利用它给法国以致命一击。英国外交部力图加剧法德冲突,使法德两败俱伤,以便在解决法德矛盾冲突中,充当仲裁者的角色,使英国成为处理欧洲大陆事务的决定因素。英国还意识到,要干预鲁尔的被占领,必须与实力强大的美国携起手来。1923 年 1 月,英国首相鲍尔温访问美国,在鲁尔问题上,双方协调了立场。

法比军队侵占鲁尔的行动,在德国引起极大的愤慨。与此同时,德国垄断财团在英美的支持下,采取了“消极抵抗”政策。德国政府声明停止向法国和比利时付款和供货,号召矿山、企业、铁路运输部门的职工,对占领当局的各项措施进行抵制。但鲁尔的被占领和“消极抵抗”运动,使刚刚开始恢复的德国经济陷入崩溃。德国丧失了钢铁产量的 80%,煤产量的 85%,铁路运输和矿山交通的 70%,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资本大量外流和外汇投机买卖的盛行,造成黄金储备枯竭,政府财政收入只能弥补支出的 19% (1923 年),经济崩溃加剧了政治动荡。1923 年上半年,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10 月 23 日,在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领导下,汉堡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筑起街垒,与政府军战斗了 3 昼夜。这次革命虽被镇压下去,但却震撼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加深了德国政府的危机。极端反动势力也利用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大肆活动,尤其是巴伐利亚的反动力量。11 月 8 日,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伙同鲁登道夫集团,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以武力首先在巴伐利亚夺取政权,然后向柏林进军,一举推翻魏玛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建立由他主宰的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处于极大的危险中,施特雷泽曼惊呼“政府正坐在火山上”<sup>[10]</sup>(第 725 页)。到 8 月 9 日,德国政府已无力继续“消极抵抗”。

法国占领鲁尔期间,不但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使本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失。鲁尔地区因“消极抵抗”而几乎全部停产,煤炭产量急剧下降。不仅如此,法国还为自己的占领军付出了高达 10 亿法郎的开支。占领鲁尔导致德国停止支付赔偿,而赔偿的中止又严重损害了法国财政的信用,法郎开始贬值。这时,英美为了打击法国,又火上加油,向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法郎和有价证券,大大加速了法郎的贬值,使

法国的财政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国际舆论的指责,瑞士、瑞典和荷兰等国的抗议,也使法国在政治和道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法国国内工人群众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占领鲁尔,法国政府内外交困,处境维艰,英国又会同美国,把一度支持法国占领鲁尔的意大利拉拢过去,共同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法国停止占领鲁尔和重新审议赔偿问题。

鲁尔危机所造成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英美的压力,使法德两国政府难以坚持原来的政策。德国新上台的施特雷泽曼政府,于 1923 年 9 月 26 日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法国则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向美国摩根财团求援,以得到 1 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作为条件,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重新审查赔款问题。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按实力,也就是以经济、金融、军事等实力为依据来瓜分世界的。战后,美国凭借它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企图夺取战后欧洲的领导力,进而称霸世界。但美国的世界新秩序与英法恢复旧帝国统治的主张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日等国的联合抵制,使美国的霸权计划受阻。在欧洲,战后美国披着“孤立主义”的外衣,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政策:一是逼债,二是实行高额关税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三是在经济上扶植德国,企图利用自己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实力来影响欧洲,使之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从而达到控制欧洲的目的。美国的目的是:以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将资本输入德国,使德国的经济活跃起来,为德国赔款问题提供物质基础,这样既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又能在赔款问题上对欧洲发号施令。法比占领鲁尔,严重地损害了美国在欧洲的利益。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将造成德国经济的崩溃,势必彻底破坏美国把德国当做销售商品和输出资本市场的计划。同时,它也同英国政府一样,认为这一事件严重阻碍了整个西欧和中欧经济的“复兴”,这对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利益极为有害。对美国来说,特别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鲁尔问题和德国赔偿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美国能否收回战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等国都积欠有美国的巨额债务,现在它们都把这与赔款问题联系在一起,即准备用所得的赔款来偿还战债。很明显,如果欧洲协约国得不到德国赔款,就无法(也不愿意)向美国偿还战债。法国占领鲁尔导致德国停付赔偿后,战债面临着被勾销的危险,这当然是美国深为忧虑的。此外,它还认为鲁尔事件大大加剧了德国政局的混乱,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倾覆的危险,德国的局势如继续恶化,将使欧洲大陆的现存政治社会结构和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美国政府认定自己当前最紧迫的外交任务就是拯救德国经济和财政,恢复赔偿支付并促使法比占领军退出鲁尔。

早在 1922 年 12 月底,当英法在赔款问题上关系破裂,法比准备占领鲁尔的前夕,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纽黑文对美国历史协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我们正急切地关注着欧洲的经济形势,我们不能仅让欧洲人自己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如果处置不当,我们也要受其影响<sup>[11]</sup>(P. 341)。1923 年下半年,鲁尔危机发生重大变化:法德两败俱伤,英国亦无力充当“调解人”,而且法国内阁已批准华盛顿会议文件<sup>[12]</sup>(P. 114)。这就为美国插手赔款问题,控制欧洲打开了门户。

1924 年 8 月,伦敦国际会议正式通过了以道威斯为首的专家会议提出的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的方案,即所谓的《道威斯计划》。美国代表担任了事务总管,这样,美国就挤掉了原先在赔款委员会里起主要作用的法国,掌握了解决德国赔偿的大权。《道威斯计划》表面上着眼于经济问题,即解决德国赔偿问题,实际目的却并不如此,它要通过赔偿问题的解决,在政治上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是迅速稳定极为混乱的德国局势,巩固魏玛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维护和加强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二是为英美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大规模打进德国,建立对德国经济的控制创造条件;三是恢复和加强德国经济实力,使之能与法国抗衡,以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同时也可以牵制苏俄。

根据《道威斯计划》的要求,1924 年 11 月中旬,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全部撤出鲁尔,鲁尔危机终于解决。

### 三、变化中的欧洲格局

鲁尔事件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调整的转折点。其后,帝国主义在欧洲政治格局中的实力地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法国是大输家。地位一落千丈,被迫从争夺欧洲霸权退而采取守势。法国曾一度掌握的对赔偿事务的监督权、控制权、领导权都被美国夺去了。法国所获的赔偿额大大减少,其赖以建立欧洲霸权的财政支柱倾斜了。战后的凡尔赛体系给法国套上了一辆它根本就驾不动的车:维持一种德国不肯接受的安排又得不到成功所必须的支撑<sup>[13]</sup>(第 57 页)。法国已无力迫使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在欧洲事务中处于某种孤立的状态。法国冒险出兵鲁尔,是它战后骄横一时达到顶点的反映,也是它从优势转为劣势的起点。《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说,法国对鲁尔的“坚决行动是法国政府在与德国打交道时最后一次不顾英国的反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此以后,法国只有在英国的支持下才能行动”<sup>[14]</sup>(第 176—177 页)。

英国有得有失。英国利用鲁尔事件有力地遏制了当时称霸欧洲、穷兵黩武并且强占德国领土的法国。英国的“扶弱抑强”的欧洲均势政策取得了效果,使它在欧洲的地位有所加强。但鲁尔事件同时也表明:英国一向不需要也不允许他人插手欧洲事务的做法已行不通了,英国力量的不足,使它不得不借助于非欧国家美国的力量。英国不但最终没有得到法德关系仲裁人的地位,反而为美国势力进入欧洲铺平了道路。

德国以鲁尔事件为标志,度过了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危机,开始逐渐恢复经济实力和 大国地位。德国在英美的扶植下,垄断组织大大地加强,1925 年和 1926 年成立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和钢铁公司,成为德国军事经济潜力复活的两大支柱。此外,电气工业的“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军火工业的“克虏伯公司”也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1923 年底,德国进行币制改革,按 1:10 亿的比例,用新马克收回了全部旧马克,稳定了通货,并迅速平衡了财政收支。鲁尔这一重工业基地重新为德国垄断资本掌握后,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在高利息、高股息的吸引下,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1924 年至 1929 年的 6 年间,涌入德国的外资,至少有 100 亿至 150 亿马克的长期投资和 60 亿马克的短期投资。到 1929 年,德国工业产量再次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而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德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德国又重新步入大国的行列,而且很快地再次成为与英美垄断资本竞争的劲敌。法德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欧洲均势再次被打破。同时,德国工业实力的恢复和加强,又为尔后法西斯势力取得政权后发动世界大战,准备了经济基础。

美国是大赢家。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双双获利,不仅收回了大批战债,更主要的是取得了处置德国问题的领导权,而且在政治上对欧洲事务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斯大林评论说:“法国的领导权为美国所代替了。”苏联《真理报》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军队撤出了鲁尔,而美国的军队却占领整个德国。”从此,美国抛弃了不介入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在赔款问题上的激烈斗争以及不同的对德政策,客观上给苏俄充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帝国主义阵营,打破帝国主义的反苏包围圈,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以苏德《拉巴洛条约》为突破口,摆脱了建国以来严重的孤立困境,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往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鲁尔事件,破坏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原有力量平衡,使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极度紧张,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调整对苏政策。1924 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苏英建交为先导,揭开了“承认苏联”的序幕。从 1924 年 2 月到 1925 年 1 月,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瑞典、丹麦、法国和日本等 22 个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扼杀苏联和外交上孤立苏联的政策彻底破产,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时期终于来到了。

鲁尔事件的解决和道威斯计划的实施,为欧洲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洛加诺公约》刚正

式确定了这种新的格局。鲁尔事件给人们两点启示:第一,在世界整体已形成的条件下,牵一发动全身,一个鲁尔事件引发大国力量对比的巨变,最终导致欧洲以至世界格局的巨变。第二,国际矛盾只有通过和平谈判,通过妥协达成协议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暴力冲突甚至战争只能带来巨大震荡,造成极大恶果。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李植枬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 参 考 文 献

- [1] Aldcroft, Derek H. From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1919- 1929[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2] 齐世荣,等.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 1分册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 [苏] 门德尔逊. 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 第 3卷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7.
- [4] G. P. 古奇, 哈罗德· 坦珀利. 有关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 1898— 1904年: 第 2卷 [Z]. 伦敦: 英国皇家文书局, 1928.
- [5] Jordan, W. M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18~ 1939[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 [6] A. C. 柯立芝. 二十五年来英法关系 [J]. 国闻周报, 1928, (24).
- [7] [美] 斯图尔特· 休斯. 欧洲现代史 1914— 1980[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8] 和森. 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 转引自现代国际关系史参加资料 1917— 1932[Z]. 北京: 高教出版社, 1958.
- [9]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 第 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10] 苏联科学院. 世界通史: 第 8卷下册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8.
- [11] Toynbee, Arnold. Survey of Intentional Affairs 1924 [Z].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 [12] Costigliola, Frank. Awkward Dom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 with Europe 1919— 1933[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3] [美] 迈克尔· 曼德尔鲍姆. 国家的命运—— 19世纪和 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 [14] [美] 威兼· 夏伊勒. 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上集 [M]. 海南: 南海出版公司, 1990.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Ruhr Event in 1923 & european Changes in Setup

ZHANG Tao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Tao (1957-), male, lecturer and master,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Ruhr Event, known to be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djustment during the early post war and the tense conflicts for the domination over Europe among the imperialist powers contributes to the rapid disintegration of Versailles System and to shaping the pace for the new political setup of Europe.

**Key words** Ruhr Event; Europe; great changes